

我忆邓小平

于光远◎著



权威披露邓小平两度复出、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在历史重要关头挺立大智慧和非凡气魄

我忆邓小平

于光远◎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忆邓小平 / 于光远著.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13-08736-3

I. ①我… II. ①于… III. ①邓小平 (1904-1997) - 回忆录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7133号

封面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我忆邓小平

于光远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汪 芳

责任校对: 戴文英

封面设计: 张合涛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4.5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736-3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回忆录，回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我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

说起我同邓小平的接触，“文化大革命”前很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一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一百八十多篇。会上有六十八人作了口头发言，四十五人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

一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一九六三年底，我和韩光、范长江等随聂荣臻去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也在场。记得那天正逢罗荣桓元帅病逝，一开始，毛泽东提议大家肃立，为罗荣桓默哀。汇报中，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

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同他有比较多的直接接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组建了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已经多年“靠边站”的我，调到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这个机构被合并到中央办公厅为止。这五年，除了“批邓”的一年多时间外，政治研究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秀才班子”。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也有了改变，只有胡乔木、我和邓力群三人。在这个时期，又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我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并且列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今年是邓小平一百岁华诞。^{*} 为了纪念他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就亲身的经历，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这样一本书。我作了一番仔细的回忆，又利用了自己保存的资料，努力做到没有重要的遗漏。在书中，我还把一些照片插在有关的章节里。我想这样做，可以给读者一种更加亲切的印象。

^{*} 本书是于光远先生的遗稿，写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由于种种原因，在于光远先生生前和逝后一直未能出版。此次出版有零星删改，得到于光远先生家人同意，特此说明。——出版者注

目 录 MULU

写在前面 / 1

组建政研室的提议 / 1

建 室 / 8

第一次见面 / 12

分 工 / 16

“读文件” / 19

收集和转送材料 / 27

人员和机构 / 35

代管学部和筹办《思想战线》 / 45

长远规划会和《工业二十条》 / 57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72

《论总纲》 / 89

转刘冰等人的信和“批邓” / 97

- 揭批“四人帮” / 108
- 政研室存废问题 / 118
- 转机 / 124
- 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命运 / 132
-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 141
- 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件事 / 152
- 更名 / 164
- 支持于光远等人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 / 172
- 关心和指导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 / 179
-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190
- 东北讲话 / 200
-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 211
- 跋 / 236

· 组建政研室的提议

一九七五年六月，记不清楚是哪一天，我忽然接到胡乔木的电话，约我见面。

这个电话让我很意外。在这之前，我同胡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还是一九六一年的事。那年年初，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带一个调查组去湖南农村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三月，中央在广州开工作会议，胡乔木和我都参加了。会后，他和我各奔东西。后来知道，会后不久他就去外地养病，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和我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在红卫兵、造反派召开的多次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上，我作为“陪斗”，见过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薄一波等人，但是从没见过胡乔木。一晃十四年，彼此音讯全无，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而且要我去见面，我着实猜不透是怎么回事。

见面后，看到胡乔木的面孔没有多大变化，我想我自己也会是这样。熟人见面总免不了寒暄几句，但我同他从来没有聊过天。他不喜欢聊天，那天只说了几句就进入正题。而这个正题，更让我意外。

胡乔木告诉我，现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考虑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为他服务，做调查研究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已经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已经有九年没有工作，这年上半年，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要我到国家计委做些带研究性的事情，但只不过是当“客卿”。现在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当然很高兴。

胡乔木还告诉我，邓小平考虑，为了工作方便，把这个研究室设在国务院而不设在党中央。写到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情况，很多人以为邓小平从一九七五年初开始就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了，不少书和文章也这么写。其实并不确切。这年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邓小平是七月初才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胡乔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才方便，不过我一听就明白：那时，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意识形态的几个党中央部门更是控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如果这个政治研究室归属党中央，将很难开展工作。

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由来，我后来才知道了一些情况。

邓小平有这个想法是在这年年初，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说成



■ 一九七五年上半年，于光远（右一）和林乎加（左二）在辽宁调查时的合影。（作者提供）

立政治研究室，而是说要找一些人当顾问。这年一月六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找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指“文化大革命”前在中苏论战过程中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由邓小平领导，常驻钓鱼台，“九评”就是这个班子写的。邓小平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说，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

胡乔木说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他做不合适，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做了结论



■ 一九七四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一一六页）

嘛！邓又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还嘱咐胡乔木，他所谈的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还没有讨论，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的前一天，即一月五日，中央发出了这年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毛泽东还提议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邓同胡乔木谈话两天后，八日至十日，党中央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邓小平所担任的职务更多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是邓过去未曾担任过的。这说明邓小平将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负起主要责任。作为承担如此紧要和繁重工作的领导人，邓自然需要一个“秀才班子”，而中央当时并没有一个这样的现成班子。

不知什么原因，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之后，组织写作班子这件事拖了几个月。也是后来才知道，这年上半年，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政治较量，也是他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的第一轮较量。

“组阁”失败的“四人帮”，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不久，便打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旗号，宣称“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把矛头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四月十八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且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二十三日，毛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的批示还要求将这个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且批评他们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多次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行径以及他们的宗派活动。江青等人认为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王洪文



■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进行各方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第一一七页）

写信给毛泽东，攻击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江青还给毛泽东打电话。五月三日，毛泽东自己主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表示：“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毛还明确批评了江青等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据说，这是毛泽东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了话，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

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批准，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

议，批评“四人帮”。邓小平作中心发言，强调毛主席提出政治局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邓还驳斥了江青等人对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责：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邓说，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一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继续批评“四人帮”。邓最后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还要将会议情况报告毛主席。

几天后，邓小平利用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向他汇报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毛表示：“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还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对邓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表示：“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发生了这场较量，邓恐怕一时顾不上组建写作班子的事情。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一番话，算是对这次较量作了个总结。显然，邓在这个回合占了上风。

这一轮较量有了眉目，邓腾出工夫来，又开始考虑写作班子的事。六月八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重提此事。这次邓小平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邓要胡乔木提出这个政治研究室的名单，胡乔木加上了我。

六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写给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附了一段话：“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胡乔木找我谈话是在邓小平写信之前还是之后，我已记不起来了。不过，不久以后中央就下发了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通知。

· 建 室

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国务院发出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日子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恰好是我六十岁的生日。从这天起，政研室算是正式建立，我算是正式恢复工作。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政研室的负责人一共七位。前面说的邓小平写的那封信只提到六位，后来又加上了邓力群，排名顺序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

政研室的其他六位负责人都是我的熟人。胡乔木不必说了，他是我的老同事，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同他见面，彼此相识。以后，我和他先后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共事。我在中央青委时，他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部长；我在中央宣传部时，他又曾经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两个单位，他都是我的领导。

吴冷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来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地位重要得多。中央高层的许多会议他都列席，毛泽东经常找他，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列为打倒的对象，但即便是作为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他也特别“关注”，说过“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样的话。

胡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央宣传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他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王惠德和我合作写过一本“畅销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话》。我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时，他兼正处长。

熊复在抗日战争前是“民先队”成都地方队部的队员，成都地方队部的队长是韩天石。当时我在“民先队”全国总队部，负责同各地“民先队”队部联系，同成都队部联系是比较多的，不过我没有同熊复联系过，只同韩天石联系过。“文化

大革命”初期，“砸烂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熊复被派到中宣部当了一名副部长。那时陶铸兼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陶铸被打倒后，熊复便也成了中宣部的“新阎王”之一。一九六九年，我们一起去了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成了“同学”。大家都是“走资派”，又有历史关系，所以我常去他的房间同他聊天。

李鑫是康生的秘书。他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我并不认识，后来康生看上了他，调到身边当秘书，我才在康生家经常见到他。

邓力群也很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副总编辑。我主持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康生提名我和邓力群负责，因为共同做这项工作，我们曾有不少接触。又因为红旗杂志社用了中宣部盖的大楼的一部分，我们还成了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勒令“劳动改造”，一起坐卡车到城外卸垃圾。押送我们去劳动的红卫兵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两个“走资派”坐在垃圾车上，有机会不受监督地闲聊过。

在这样一个全是由熟人组成，而且由除李鑫外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组成的机构里工作，我觉得一定是会很愉快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研室有这样一个阵容真是不寻常。如果不是有大手笔的邓小平敢于起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不